

从理性批判到语言实验

——狄金森诗歌中的融合性思维景观和“性灵”世界

李应雪

【摘要】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营造了主体性思维景观和个体化审美空间。主体性思维融感性与“慧性”于一体,打造感知和体察世界的“融合性思维图景”;审美空间是个体情感和情趣塑造的性灵世界。在其诗歌中,物是物自体而非康德所谓的现象;人是自由的人,在“存在”中不断获得和扩展“智慧”。诗人背离语法惯例,进行语言实验,将处于诗句任意位置的普通事物大写。狄金森以此反抗既定语言秩序,批判等级制理性传统。通过塑造“性灵人格”,诗人探索人类本性和本心,抗击理性人格对存在本性的遮蔽。

【关键词】艾米莉·狄金森;理性批判;语言实验;融合性思维景观;性灵世界;悬置

【作者简介】李应雪,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大连 116026)。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24.2.79~87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L21AWW001)。

一、引言

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作品以对思想传统和思维定势的反思与批判著称于世。诗人自我意识建构过程中的现象学追问与她对理性传统的解构相伴而生。罗杰·林顿声称:作为现代思想的先知,狄金森充分展现了自我意识对于信仰形成的作用。不仅如此,狄金森从个体化存在追索自我意识的形成,推崇艺术本体论价值,将人类的审美存在作为人生信仰。^[1]

林顿等认为,狄氏诗歌通过现象学“悬置”和“还原”,凸显理性传统与“现实存在”之间的“齟齬”。通过研究狄金森对宗教哲学的诘问和反叛,林顿意图建构诗人的艺术哲学体系。他的研究虽然引入了存在美学的概念,但将狄氏诗歌美学看作一种“现代理性”;他抽取狄氏诗歌美学中的某些“思想与思维要素”,并将其等同于“现代意识与现代理性”。这种定位与狄金森诗歌美学中的“感性传统”背道而驰,因此无法回答狄氏诗歌创作的终极问题,即诗人如何通过诗歌创作打造艺术哲学,从而舛忤理性范式对人类存在的囚禁。本文认为,狄金森不仅否决了西方宗教和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更是展现了融

合性思维景观和“性灵世界”。她的创作破除了理性主义对人类存在意义的闭锁,重新开启“人本具足”的获取智慧和创造幸福的能力。^[2]狄氏诗歌营造了主体性思维景观和个体化审美空间,即结合感性与“慧性”于一体的感知和体察世界的能力以及充分发挥个体情感和情趣创造力的性灵世界。

她的诗歌昭示了如下真谛: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审美的生存。人只有与世界融合,才能将世界显现于内心,从而“存在于世界之中”。任何将人与世界分立的认知体系只会破坏人与世界的本真关系,异化人的存在。狄金森的诗歌表明,人是依靠“慧性”而非理性获得存在的真实感。“慧性”是在与自然的漫长融合中达成的觉悟与修养。“慧性”从个体存在出发,通过与世界的深度融合,知晓宇宙的总体性法则及其在现存世界的运行规律。可见,狄金森引领了感性哲学的新方向,对后世的哲学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3][106]}

与其思想的突破性相应,狄氏诗歌语言的革新性同样值得关注。诗人打破语言理性建立的意义牢笼,揭示能指与所指的循环对存在本性的压制,反思语言规训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操控。其诗歌中的破折

号形成了特殊的语言逻辑和意义表述方式。它是对语言既定意义的延迟和否定,同时通过意指链条的断裂催生一种新的意义组合;它突破理解事物的思维定势,以开放的语言表述方式和松散的意义连结达成对既定判断的重估。破折号引发的模糊性成为检验和反思传统思维方式的有效手段。^[4]狄金森拷问语言逻辑和理性传统之间的共谋关系,消解语言符号体系包含的二元对立式思维。诗人反思以语言为核心手段建立人与世界关系的局限性,质疑西方思想衣钵的合理性和真实性。

综上,本文拟重点考察狄金森对理性传统的批判和她对语言逻辑的叛离,分析其诗歌中呈现的融合性思维景观和“性灵世界”,其感性与“慧性”认识论、审美存在论、诗歌语言实验等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构建狄金森诗歌的哲学空间和审美世界,展现“狄金森思想与理性哲学及主体性哲学的重大关系”^[5]。

二、融合性思维景观:感性与“慧性”的结合

(一)自我意识的“现象学”反思:反范畴论的“慧性”思维

以康德哲学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传统把世界范畴化。康德把进入人类自我意识中的事物定义为可知领域,其他直观杂多则被知识所拒斥;将人类获取知识的能力看作某种天赋秩序。人类认识的根源在于内心普遍和必然的形式,赋予人类经验以意义并形成知识。^{[6]352} 尽管康德试图调和唯灵论和唯理论的矛盾,但并没有克服理性的局限性,对人类的精神自由问题更是语焉不详。胡塞尔虽然认识到科学和思想的本质性不同,将经验知识“悬置”从而“回到事物本身”,但忽略了思想来源于现实存在。他将“存在”抽象成概念,丧失了讨论人类精神自由的客观基础。

狄金森在诗歌中探讨了突破理性认知界限、追求人类精神自由的问题;对自我意识的追踪和反思体现了她对解绑理性困境、打造时代新思维的探索精神。在其诗歌全集第一首《醒来,九位缪斯!》中,她开宗明义,宣布创作意图:“九位缪斯快醒来,为我吟唱圣歌神曲;解开那绑缚的绳索!”^{[7]3} 接下来,她点

明诗歌主旨:世间的一切看似独立,实则相互依存。单一存在物“叹息、低语、绝望”,注定要走向“合而为一的融合性存在”。一切存在物都在相互靠近、彼此对位:“陆地、海洋、空中之所有都在寻求彼此交融之物。”^{[7]3} 狄金森指出了存在物之间环环相扣的依存关系:

The bee doth court the flower,(蜜蜂追逐花朵,)
the flower his suit receives,(花朵接受追求,)
And they make merry wedding,(他们愉快地结合,)
whose guests are hundred leaves;(上千片树叶来
见礼;)^{[7]3}

The wave walks the seashore,(海洋掠过沙滩,)
with eye to see the moon,(浪花的目光投向月亮,)
Their spirits meet together;(她们的灵魂融合;)
they make solemn vows.(发出低沉的誓言。)^{[7]3}

诗歌贯穿着诗人对自我意识形成过程的现象学反思。当她追踪自我意识产生的路径时,发觉自我意识与其他意识并不是二元分立的关系,它处在无数意识和存在物的循环关系当中。没有一种意识能够脱离其他主体和客体而存在。因此,以理性范畴来规定自我和意识的企图被存在证伪。宗教理性和科学范畴是人为划定的等级秩序,必将被现实世界中万物相辅相成的关系所颠覆。诗歌采用“非常规”的手法揭示存在的本相,破除等级化思维的假象:“虫豸求爱活体,死亡索取新娘;夜晚联姻白昼,清晨顺接薄暮;尘世是快乐的姑娘,骑士效忠天堂”^{[7]3}。

康德把现象和“物自体”对立起来。在他看来,能被经验把握的现象服从既定法则,而“物自体”超越此法则,不能被人类知识所认识。^{[6]353} 这似乎预示着“存在”和人类自由的深刻矛盾,也暴露了理性的局限性。在狄金森的诗歌中,“物”具有某种“物自体”的特性,拒绝被概念化;人是自由的人,在存在中不断扩展“慧性”。狄金森不将世界客体化,更不以人类知识范畴割裂人与世界的关系。其诗歌中的“物”与人相互依存、相互靠近。对“物”与人融合关系的揭示既是诗人展现的“存在真理”,又是她的审美存在哲学的思维起点。狄金森追求的是知识的终结和思想的开始。她的存在哲学和她对人类思想自

由的追寻密不可分。

通过对经验科学和理性认识论的悬置,狄金森证明了“在”与“在者”的同一性。她的诗歌说明,人类思想不是抽象的概念体系,而是历史的自由之思。《尘世荣华容易尽》一诗极具哲学批判性,它揭示了宗教认知和理性法则对存在本性的强奸。“物”“我”分离不仅导致对“物自体”的破坏,而且限制了人类认知的拓展和精神自由。诗歌中五处拉丁语的用典首尾相扣、内含回环,以人类存在的短暂性来反讽宗教理性妄图一统世界、获得世界终极解释权的企图。在“死亡象征和死的警告面前”,人类迫不及待地意图征服世界:“我来,我看见,我征服”。^[74]诗歌中的“我”将神祇逐下神坛,击破宗教将世界统辖到某种认识范畴内的幻想。“我”用比宗教权威更强势的口吻命令那些神祇、英雄和人类的祖先。他们貌似神圣的行为被强行拉入现实世界当中,剥去了自以为是的外衣:

Peter, put up the sunshine(彼得!把太阳光关掉;)
Patti, arrange the stars,(帕蒂,把星辰安排好;)
Adam, come away with me,(亚当,跟我离开天堂,)
So shalt thou have a pippin(你会得到另一个苹果,)
From off my father's tree!(来自我爸爸果园的
枝头!)^[75]

“物的本性”是将事物还原到与他物的连结中才得以呈现的。无论是宗教理性还是科学规定,都因自设范畴界限而使人与物对立、感性与理性对立。宗教和科学范畴中的等级制设定人类思维和活动的界限,而狄金森通过“反常规”的方式跨越既定的认识障碍。她以普通人的身份命令神祇和帝王,以戏谑的口吻安排其神圣职责,仿佛料理寻常的生活琐事。她以亵渎神圣的方式解构了宗教认识论中等级制的荒谬和空洞。“超验存在”规定的神圣领域因其与人类存在毫无关联而被嘲笑,而人类必须立足现实才能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宗教经典设定了天父的权威、偷食禁果和被逐出天堂的逻辑。这极大地违背了人类探索未知、寻求自由和幸福的本性。狄金森倡导的自由旨在不断实现自我意识的提升和完善,而幸福是“物、我”两相靠近的审美境界。诗中

“我爸爸的果园”既是世俗意义上对伊甸园的反讽和对位,又是对人类精神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审美塑造。

宗教对超验权威的假定阻碍个体与自然融合,更难以实践审美存在的人生信仰。狄金森以个体生命视角探讨理性的有限性和性灵的宏阔性、超验真理的空洞与审美存在的充实。诗人将上述讨论纳入诗歌的哲学对位关系当中,而诗中哲学反思的落脚点在于反理性的自我觉醒。宗教认识论不仅对人性和神性、物质和精神有着等级森严的规定范畴,而且通过对天堂、人间、地狱严格界限的虚假设定贬损世俗存在的价值。上述等级化的对立思维都在狄金森描绘的现实中被逐一击破;她以个体生命短暂而真实的存在抗击宗教认识论的暴力给西方人带来的精神戕害。

(二)主体性哲学思辨:审美存在和精神自由

狄金森诗歌中的世界是审美的世俗世界。它是诗人承认死亡的必然性之后对“此岸”存在意义的重新界定和评估。与理性哲学的根本性不同之处,在于她对世界和生命的肯定,其打造的哲学更是一种审美的形而上学。诗歌中经常出现一个具有超越性思想的女性“我”,“我”不接受宗教对生命意义的否定,也拒斥科学理性对于生命的机械论界定。她探索在“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中建立一种联动式、开放式、融合式、体验式的审美人生境界。通过采用一种女性化的声音和意象,狄金森摆脱了19世纪主流思维范式的羁绊,力图塑造女性思维主体性。^[835]它建立在以“我”的感性体验和内心体悟的智慧基础上,是对现实的通达和生命意义的承载。

狄金森诗歌的永恒主题是她对感性思维前景的探索。它可以超越理性思维引发的怀疑主义和生命的挫败感。^[91200]她的诗歌塑造“天人合一”的“慧性”思维以及合乎“道与德”的存在状态。“慧性”是从个体化审美存在出发,通过情感、直觉、想象力的共同作用实现与世界的深度融合,通达宇宙的总体规律和运行法则。它是感性思维走向艺术和审美纵深境界的极致表现,也是对宇宙精神的深度体验和领悟。

《归家人的脚步》和《我有一只春鸟》便是两首“慧性”诗歌。前者通过描述先民们与自然浑然一体

的存在,探索超越理性世界观之上的“慧性”认识论。诗歌描绘了如何用蓄养万物的德性能量再造生命两大系统(身体能力和精神创造力),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后者提倡对世界的体悟和了悟,开拓生存的审美境界,用“正、善、德”去涵养天地能量。通过天德养神、地气养形,培养和形成道德人生的品格和能量,实现通达天地的“慧性”思维观。狄金森倡导突破狭隘理性对人类存在的束缚,获得智慧的觉醒和精神的自由,成为存在的主人。^{[10][3]}她的诗歌为读者打开了一个真实世界的天窗,从中窥见主体性哲学的前景。她将被理性主义围困的自我认识调整到整体性和有机论的哲学视野中来。这不仅是对困扰西方世界的惰性思维的突破,更是对个体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极大解放。在这个意义上,狄金森超越了时代。^[11]

狄金森诗歌中的主体性哲学是审美的存在哲学,具有批判功能和建构意义。一方面,她批判了宗教理性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剥夺并尝试恢复和确立人的主体性。宗教不仅将自然象征化,更将人客体化和物化。狄金森塑造的哲学将对所谓“神圣心灵”的关注转移到对人自身的关注。她在诗歌中强化和凸显主体性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提升到存在本性的高度之上。另一方面,狄金森身处现代理性思维的包裹当中,深切地感知到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主体性的危机。主体性危机来源于科学理性的膨胀造成的人类自身的客体化,人愈发沦为自身欲望的客体。现代性危机的表征就是人类自身的分裂和变异。克服现代性危机同样需要在哲学上重构主体性。

在狄金森所处的时代,宗教理性虽然式微,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主体性的构建。宗教理性对于人类自身和人类存在的物化必然引发现代思想领域的重大变革。主体性原则便应运而生,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规定性和代表性特征。然而,科学理性和功利哲学把主体性推向了绝对化。狄金森颇具前瞻性地预见了这一现代性危机问题。她试图开辟一种能够统摄人类自身需求,使人在存在之中不断获得精神完善的主体性,而不是达成欲望对世界

的投射。

狄金森的主体性哲学和审美存在论相辅相成。她在人类历史性的审美存在中重新关照宗教理性和现代哲学确立的前提。她的浪漫主义抒情诗把“历史问题”前景化,展现了人类审美生存中蕴含的历史性阐释的可能。^[12]她既要树立主体性的崇高地位,从主体性出发界定人类存在的性质和内涵,又摒弃了康德主体性哲学将人与自然等“诸存在者”对立起来,以一个抽象的“存在者”作为外部世界的评判尺度的哲学逻辑。康德开创的现代美学将知识作为审美存在的赋形者和界定者。人类存在的审美特性被限定在自我意识这个真理性存在的假定前提之上。存在及其审美内涵变成了一种先天的综合判断,而与人类存在的动态性、历史性、时间性失去了关联。

狄金森的主体性哲学是对宗教哲学的反驳,揭露它对人的主体性的贬损和压抑。狄氏哲学以人的存在为哲学第一命题。^[13]更为重要的是,狄金森解构了现代理性哲学对人的主体性的抽象规定,从人与天地万物的平等、和谐关系中重新定义人的存在。它赋予人的主体性以动态可塑性、与包括自然在内的其他存在者的交互往来性,从而给予“存在”以具体和鲜活的意义。

在《晨曦比以往温和》当中,狄金森首先点明了所有存在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她采用一系列人格化用词,为自然涂上灵动的色彩,使之拥有和人类同样的主体性,而“我”却成为此图景中不甚重要的配角。每一个自然中的存在者都在各自生动的存在状态中获得独特的表情:

The morns are meeker than they were-(清晨比先前来得亲切,)

The nuts are getting brown-(毛栗朝着深棕色蜕变;)

The berry's cheek is plumper-(浆果的面庞更加圆润,)

The Rose is out of town.(玫瑰已经出城不见。)^{[7][1]}

这种拟人化描写营造了自然丰润宜人的丰收场面,揭示了自然作为存在物变动不居的特性。自然万物相依存、相关照的动态之美也与“我”形成“主体

间性”关系,是融合“我”的主体意识的根据。同处“世界”之中,“我”与自然形成了“物我一体”的审美共同体:

The Maple wears a gayer scarf-(枫树的披巾更艳丽,)

The field a scarlet gown-(田野的红裙更灿烂;)

Lest I should be old fashioned(我怕自己不合时宜,)

I'll put a trinket on.(打算戴个挂件搭配。)^{[7]11-12}

“我”并没有以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对自然万物进行居高临下的审视。不同于理性美学将审美过程对象化的认识论模式,以上诗歌中的美学是主体间相互合作、彼此烘托的关系。双方共同缔造的是万物共生之美,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存在者一起达成的存在之美。^{[14]47}

与理性传统不同,狄金森不以悬置人的真实存在为代价进行玄学化的讨论。她力图解决人类精神自由和审美生存的问题。西方宗教和哲学传统对人类存在价值的贬损由来已久,理性主义更是阻碍了人在历史性的存在当中寻求福祉和智慧。狄金森通过审美存在实现途径的探寻,建构了新的主体性哲学。她裁决了宗教哲学对现实世界的遗弃和对现实人生的挞伐,同时预见了人类主体欲望泛滥造成的现代性危机。在基于现实存在的哲学和美学双重意义上,狄金森有效地实现了对传统和现代理性的证伪,并塑造了超越其上的审美哲学。

三、语言实验与性灵世界:感性情趣与心灵书写

在狄金森反思和批判理性传统的时候,深刻揭露了逻格斯对存在本性和思想自由的遮蔽。逻格斯是理性与语言的合谋,意图通过语言背后的理性逻辑来定义存在的本源和真理。逻格斯的理念对人类存在与思维形成了双重盘剥,使西方哲学陷入危机。狄金森诗歌中的世界是变化的性灵世界,是由感性情趣形成的创造性的世界。它拒绝用一切理性决定论的方式追问和解释世界的本源和目的。语言逻格斯不仅拒斥现实世界的具体性、变动性和复杂性,还将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完全对立起来。它将现实世界抽象为原则和规律,试图通过终极理性来还原和解释存在的本质。

(一)反语言逻格斯:边界叙事中的语言实验

狄金森诗歌的表述体系是以反男性语言逻格斯为特征的。她的诗歌以女性叙事者的存在体验为建构意义的核心要素,还融合了自然界其他生物的视角,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叙事。女性和自然共同打造了诗歌表述的“感性系统”,构建了一个“性灵的世界”。诗歌呈现的是由女性和自然共同组成的“边界体验”。它不仅塑造了与理性世界不同的融合式景观,而且推翻了语言逻格斯妄图取代世界多样性的谎言。狄金森的表意系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实验,它对语言逻格斯的叛离随处可见。其诗歌语言塑造一种多维度、松散的意义连结,处在一种既与事物联系,又和既有思想隔离的状态。

狄金森高度重视个体审美情趣和心灵世界的塑造。诗人和诗中人的情感在审美存在中形成情趣,情趣培育心灵。“慧性”思维与审美情趣的碰撞生出诸种启示,转化成诗歌创作和艺术人生的灵感。狄金森诗歌的性灵世界是艺术感知和艺术创作的空间,也是审美人生的自由地带,是抵抗和超越狭隘理性世界和机械化生活的有效途径。

狄金森对于理性和语言的悬置同时发生。在其诗歌中,语言能指在表情达意方面的权威地位不断遭到解构。她常常突破语法惯例,将处于诗句任意位置的普通事物大写。看似随意的大写既是对英语语言既定秩序的反抗,又是对等级制理性传统的不屑和反驳。

《我家里有一位姐妹》和《黄色和金红色的来宾》是展现狄金森语言实验和性灵世界的代表性作品。《我家里有一位姐妹》以超自然的手法刻画了幼年夭折的一位姐妹在诗人感情空间中的奇幻存在。诗歌以突破生死界限的视角,将这位姐妹的存在幻化成自然中的鸟儿。它“将窝搭架在我们心房”,在亲人们的思念中获得新生命。不仅如此,诗人将姐妹的生命与自然相连结。她在自然中看到了姐妹生命的延续:“如今她自己就是一首歌,仿佛六月黄蜂的歌唱。”^{[7]12}诗中的“我”聆听着“记忆中姐妹的吟唱,在家乡的小山来往穿梭,与她的距离越来越近。”^{[7]12}

诗歌创作与姐妹的歌唱获得了审美意义上的同

构,两者都与永恒自然和鲜活生命连结而成为长久的存在。狄金森将自然生物和童年时光全部大写,突出了它们在性灵世界中的重要价值。同时,她以诗化的方式解构了宗教生死观和永恒说。逻辑斯传统中词汇的感情色彩和使用规律也在诗歌中被颠覆,被重新赋予了灵动的内涵。狄金森使用了“蝴蝶被欺骗,五月茶藨”^{[7]13}等表达,并将这些词语大写。这些手法体现了她对感性情怀的重视和赞美,展现了她对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反抗。“欺骗”和“茶藨”褪去了语言既定的意义,产生出相反的语言感性。姐妹歌唱的感性魅力激发了其他生物对生命美好的渴望和向往,使得自然之美因人类的参与更具灵动色彩。同时,这种美是低调而羞涩的。它不像理性主义那样咄咄逼人,却像五月盛开的紫罗兰一样芬芳馥郁,令自然季节呈现出沁人心脾的醉人风情。语言色彩的逆转和寻常事物的突兀大写成为狄金森诗歌独特表达体系的实验手段,也是她对抗理性暴力、营造性灵世界的重要途径。

诗人不受既定语法和传统叙事语言的限制。她将上帝描写成“真理的双胞胎,依靠真理而活,一个没有生命的神祇。”^{[7]404}花草树木的兴衰枯荣、瞬间的生存感悟和爱恨情仇都可以被大写。它们成为存在本真体验的代言者,与虚假的权威分庭抗礼。女性视角使她超拔于诸种现象之上,将其还原到宇宙的各种真实关系当中。《黄色和金红色的来宾》中反复出现春天的鸟鸣和落日前的辉煌等意象。这些短暂而永恒的瞬间暗示了衰朽和死亡的必然,也预示着下一个春天和黎明的到来。其诗歌语言同样表征着理性和感性的同质性和相互转换,而真理存在于生存之流变当中不受任何范畴禁锢。建立在人类鲜活存在体验之上的直觉、情感和想象力是更具参透宇宙特性的性灵,也是统摄一切理性的源头,更是所有语言得以不断发展、永获生命动力的根本。狄金森颠覆性的感性思辨和语言批判重新界定了人与世界、理性与语言、真理与意义的辩证关系,建立了思维与存在的格式塔。

(二)性灵主体的确认:生命意识与精神空间

狄金森的诗歌创作迥异于新古典主义塑造秩

序、扼杀生命意志的理性传统,也区别于浪漫主义诉诸超验神祇、在个体本心之外寻找真理的诉求。以上两种倾向展现了宗教哲学和现代理性对个体生命情感的巨大遏抑。狄金森创作的诗歌展现生命情感的条理,彰显个体心灵情趣、自然本能,表现“真心”“童心”“本心”,表达与审美密切相关的性情、个性和创造才能。通过塑造“性灵人格”,狄金森探索本真存在,以此对抗理性人格对存在本性的遮蔽。

她的审美追求以建构主体性精神空间、彰显独特生命意识为标志,贯穿着她对现代人如何安顿心灵的关注和思考。在其诗歌感性的基础上形成了性灵,即通过发现和重塑人的本性,追求生命的真理。狄金森所有的诗作都在向理性宣战,尤其是现代理性。理性用所谓客观事实塑造理性主体和理性人格,用抽象的“存在”替代具体的生命体验。狄金森在诗歌中表达了如下的性灵思考:“存在”的真理不在外物,也无需外求。无论是自鸣客观的科学理性还是自诩至善的宗教都无法解决人类心灵无所皈依的问题,甚至强化了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而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动力都是生命情感。它统摄了直觉、想象和体悟,成就了人的本心,由此通达真理。性灵人格树立心灵主体,才有可能建立审美的精神空间和心灵家园。

诗人的性灵驻扎在自然之中,并不断开辟精神生态空间。它由诗人的审美情怀所塑造,兼具生命意志和心灵情趣,展现了狄金森对个体存在真理的探寻。在诗歌《这些都是我的旗帜》开篇,诗人“我”就以自信而独立的姿态宣布了塑造性灵世界的人生诉求:

All these my banners be.(所有这些成为我的旗帜,)

I sow my pageantry

In May

(我在五月播种下了我的盛典——)

It rises train by train--(它们列队生长——)

Then sleeps in state again--(又庄严地睡去——)

My chancel—all the plain.(而我的田垄已变成辽阔的平原。)^{[7]16}

这是狄金森倾力打造的精神空间,展现了她独特的性情——傲然世俗、不屑功名。同时,上述诗句打破了语言规制下庸常的视角和理性设定的认识框架,指向精神空间的真、趣、奇,使个人独特的情感得以抒发。以此心灵空间来关照现实,个体生存获得了超越无常、抵御凡俗的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

To lose--if One can find again--(若能再拾美好,尽管失去——)

To miss--If one shall meet--(若能再次相逢,不惧错过——)

The Burglar cannot rob--then--([那是]强盗也不能掠去——)

The Broker cannot cheat.(掮客也无法骗取。)^{[7]16}

性灵世界中的“我”是一个创造性的主体。她的主观能动性超越了客观法则的限制:

So build the hillocks gaily(于是欢快地培土建造小山丘,)

Thou little spade of mine(用我那小小铁锹。)

Leaving nooks for Daisy(为雏菊留下僻静的角落,)

And for Columbine--(也为藏红花开辟园地——)^{[7]16}

情感生命动力超越狭隘的现实环境,也超越功利主义对个体创造潜能的压抑:“你和我知晓耙头草的秘密,让我们一起为之吟唱——不要再有风雪!”“你”和“我”既是狄金森和她的精神自我的合体,也是她对于读者建构独立精神自我、提升生命意识的呼唤:“怀兰花之心胸,六月沼泽皆粉红”^{[7]12}。

个体生命价值和精神构建超越自身局限性,达到更高的生命层次,获得超凡脱俗的见识和情趣。这体现在她对“童心”和“真心”的推崇。诗歌在表现未受理性浸淫的“真心”的同时,突出对个体情感和欲望的表达,形成了诗歌的“性情”。她以自然的、活的格律替代传统格律,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真实的存在之美。诗歌中对“耙头草、雏菊、藏红花”的大写代表了她对自然之性灵的崇拜和赞美,而“强盗、掮客”则意为理性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侵入和破坏。诗歌最后传达了审美人生的形而上学。性灵的世界才是人的心灵安居之所:风雪不再,六

月粉红。

性灵世界的结构原则并非理性的法则,而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审美秩序。对万物灵性的承认与感知成就了狄金森诗歌世界的“性灵”。它排斥理性主体对自然的霸权和对人类存在意义的狭隘界定。狄金森诗歌世界中的意义无法用单一理性原则来拆解。通过对语言逻辑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驳,狄金森在美学意义上探索人类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在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关系中破除理性主宰世界的幻象。

语言实验和对性灵世界意义的探寻互为因果。前者为后者的丰富性和发展性提供了表现形式,而后者成为语言感性构建的本体论基础。在审美存在论层面上,狄金森的诗歌语言呈现出对于意义建构的追问和反思。个体发现真理的过程和其存在过程是同构的。真理不可能寄生于理性搭建的有限框架当中,而是在个体的审美生存中以变化和发展的姿态绽放出来。个体的存在是历史的、审美的、能动的,而对真理的寻求必然是关乎存在本身的,也就注定是发展的。僵化的理性不仅对寻求真理无所助益,反而会阻碍真理向个体存在的显露。

在《我听过最远的雷声》中,真实的感性体验取代机械理性并暴露后者对存在的隔膜。“远”和“近”打破了工具化思维视角下的单一界定。它们指的不是物理距离,而是心灵体验的淡漠与真切。理性思维并不能改变人类的存在体验:“我听过最远的雷声虽比天空距离更近,在酷热干燥的夏天响雷阵阵轰鸣,然而雷鸣之前的闪电却无人注意。”^{[7]655}电闪雷鸣并没有影响人们寻常生活的体验,而响晴的天和干燥的空气才是人们真实的感性体验。他们对“闪电”和“雷鸣”(此处象征科学理性)丝毫不在意,或者说前者对人们的真实存在感受并无影响。虽然诗中的“我”注意到了科学勉为其难的自命不凡,但宣称:“我不会因为闪电的造访而改变我的余生”^{[7]655}。“生命”意指生命的感性体验和情感内涵。“我”的生命内涵依赖于对外部世界真切的感知,而并非冰冷空洞的抽象概念附加给生命的负累。

机械理性不产生意义,却会引发对现实的隔离

和异化:“承蒙氧气的恩典,快乐的人会报答,但却不是对电的义务回馈”^{[17]655}。人们存在的真实感来自感性的触发形成的美感体验:“无论安居在家还是流浪海洋,电让家庭和甲板亮若白昼;它跟嘈杂的声音一样令人炫目,却与那拦截道路的刺眼光亮相伴。”^{[17]655}机械理性为世界“去魅”。它带来的不是真理的光明,而是阻碍人们抵达存在本源的障眼法:虚幻的光亮不是光明所在。在狄金森看来,真理的作用不同于理性的电光雷火,后者先声势夺人但毫无意义。真理潜移默化:“宁静如雪花,悄无声息却响震天涯,在生命自身的回响中寻找真理的阐发。”^{[17]656}以抽象概念出现的理性被狄金森以反讽的方式大写。它虽声势浩大,却无法触动人类的生命意识。生命感性和存在真理以具体的、诉诸感官的文字呈现。由此,感性书写解构了理性的虚妄。

语言逻辑斯在成就理性认识论的同时,限制了感性存在论的发展。感性存在论恰恰是狄金森诗歌着力建构的新型生命哲学,是破除西方理性传统桎梏的思想探索。狄金森穷其一生都在进行诗歌语言的先锋实验,旨在拆解能指和所指的意义循环,塑造建立在审美存在基础上的“慧性”思维和感性表述体系。虽然狄金森超越了机械理性的束缚,但无法在语言内部实现对语言自身的彻底解构,这或许也是她在生命的后期辍笔的终极原因。

狄金森在诗歌创作伊始便与主流文化价值取向和既定思维模式拉开了距离。她对宗教哲学和科学理性的思维范式展开深入的哲学反思与审美批判。通过审美存在空间的建构,诗人重塑被理性固化和拆解的生命意义,并在语言实验基础上重申语言逻辑斯对西方思想发展的限制。她的诗歌从现象学的意义上探索“元认识”形成的可能路径,表现为建立在人类审美存在基础上的融合性思维景观和“慧性”思维。对于身处传统与现代交锋当中而深陷迷惘的西方人来说,基于个体审美存在体验之上的主体性哲学在极大程度上激发了他们对真理与自由的追求。狄金森的伟大之处在于敢于挑战一切权威。以诗为思,语言逻辑斯被她

在诗歌中以实验方式拷问和悬置,从审美存在的意义上破除捆绑西方人的理性思维传统,开辟了感性思维的新型精神空间。^{[15]148}

参考文献:

- [1]Lundin R. Emily Dickinson and the Art of Belief.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 [2]Bratley R. Emily Dickinson's Rich Conversation: Poetry, Philosophy, Scie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3]Cull R. Emily Dickinson and Philosophy,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2013, 22(2): 104-112.
- [4]Dickinson E. The poetics of Emily Dickinson. E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1971, 38(1): 1-13.
- [5]Leader L. Knowing, seeing, being: Jonathan Edwards, Emily Dickinson, Marianne Moore, and the American typological tradition. Religion & Literature, 2017, 49(3): 3-19.
- [6]Kant I.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7]Dickinson E. 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Kentuck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0.
- [8]Foster T.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ity in Modern Women's Writing: Homelessness at Hom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 [9]Freitas M. Dickinson's a still-volcano-life. Explicator, 2000, 58(2): 56-59.
- [10]Furtak R. Forms of emotional knowing and unknowing: Skepticism and belief in Dickinson's poetry. Elisabeth C. The Poetry of Emily Dickinso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11]Finan T. Captivity is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and its revisions in Dickinson's poetry. The Emily Dickinson Journal, 2015, XXIV(2): 1-24.
- [12]Yu K-C. Emily Dickinson: A bee gatecrashing eternity. The Emily Dickinson Journal, 2018, XXIX(2): 123-136.
- [13]Michael J. Lyrical history: Temporality, rhetoric, and the ethics of poetry. New Literary History, 2017, 48(2): 260-274.
- [14]李应雪:《审美重构与文化反思——英语现代诗歌审美现代性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21年。
- [15]Jed D. Emily Dickinson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